

唐诗宋词

艺术与文化审视

蔡燕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唐诗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

蔡燕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蔡燕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81112-142-5

I. 唐... II. 蔡... III. ①唐诗—文艺评论②宋词—文艺评论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474 号

唐诗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

蔡燕 著

责任编辑 龙宝珍

责任校对 何传玉 汤树华

封面设计 薛 峰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书 号 ISBN 7-81112-142-5/I·110

定 价 28.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3244 邮编: 65009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言

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各擅一代文学之胜的华彩乐段，已成为民族历史文化中最精粹的一部分沉潜于我们的精神血脉之中，涵养和塑造着我们的心灵世界，所以，人们总是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吟诵谈论，这是本书合论唐诗宋词的第一个原因；另外，唐诗宋词之间虽有着表现功能、审美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但同时也有着内在的依存关联，其中最为根本的是词为“诗余”。在唐代，文人词的成型发展与唐代诗歌（特别是中晚唐诗）的流变有着血肉相依的关系，甚至在它成熟的宋代，词人创作风格流变、意象构造、典故使用等也往往以唐诗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取法渊源，这是唐诗宋词可以合论的第二个原因；从文化的层面而言，宋词对唐诗的承传色彩更为明显，唐代是一个情感超过思理的时代，而宋代则是一个理性精神高扬的时代。在这种文化转型中，诗文承载了言志载道的重负，面目渐趋老成持重，所以宋诗就如一个“五十而知天命的智者”，“渐老渐熟”（苏轼《与二郎侄》），而处于文体排序底层的词则因无须背负额外的政治教化重负，从而有效地承接了“诗缘情”的传统，呈现出感性鲜活的一面，因而唐诗宋词之间有着很多共同的质素，如皆以丰神情韵见长，令人反复把玩而仍有如“旦晚脱笔砚者”的鲜艳色泽，这是唐诗宋词可以合论的第三个原因。

作为唐诗宋词的研读者，面对古人为我们矗立的这样两座诗歌高峰，油然而生的是高山仰止之叹，这是一种面对经

典的惶恐，更何况前人对这一经典的阐释又构成了另外一重经典。所以，在今天如要对其指点评价，面对的是双重经典的压力，需有韩愈所说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狂妄。但是，在唐诗宋词的研读过程中，不断涌动着思索的困惑、焦虑、欣悦总在顽强地寻找着表达和冲决的方式，而关键是以什么为依凭消除面对经典的焦虑和惶恐，从而进入唐诗宋词的世界？这样的依凭还是要从古人那里去寻找，白居易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李白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唐诗宋词的世界中，心灵的感通是进入这一诗性世界的重要依据，有了这一点，“蚍蜉”的不自量或许也能得到古人的宽容甚或接受。基于这种思考的研究就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所以作为诗歌核心的抒情风格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的诗性思维方式成了研究中关注的重心。

在总体观念上，我所遵循的是袁行霈先生提出的“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的原则，这一原则虽然是对文学史的建构而提出的，但同样适用于特定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在具体的探究中，往往是回到历史的、文化的特定语境中去体悟、感触、把握创作主体特定的文化性格，从而去把握描述一个诗人或一个时期甚或一个时代独特的诗性思维方式及其呈现的方式和状态。文学发展从来都是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一个时期的文学风貌与当时的文化思潮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在研究思考中既要注意训练从文本片段中去探寻整体文化意义的能力，更要注重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去把握文学文本，力求在文学、文本、文化之间形成融通的阐释，这也就是文化学视角。在这种视角中，文学是以诗人的思维模式、人格模式为中介受制于独特的时代文化环境的，比如在唐诗宋词中，情感力度的强弱以及它的流走方式虽然受制于外在的音韵格律形式，但更为重要的是受制

于诗人在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文化性格，同是“潜气内转”，杜甫诗歌的抒写有着沉厚之美，李商隐的诗歌却有着纤艳之美，其原因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在中晚唐，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是随着时代精神的嬗变而转型的文化性格，这种转型对词体抒情风格的形成和成熟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文学、文本、文化的关系中，看重和强调诗人的思维模式、人格模式的中介作用，这也决定了研究中以文本作为基点，以诗人创作文化个性作为突破口，去探究诗歌抒情风格、语言风格、审美风格等形成的原因。以文本作为基点就是养成文本细读的习惯，重视阅读中的个体经验的把握和积累，逐渐形成自己的思考和观点，这是为很多古代文学研究大家所提倡而且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我自己在思考研究中力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获得带有个性特色的观点，但毕竟这只是自己的一相情愿，结果还有待各位学者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所谓“史学思维”体现在诗人文化性格、文学风貌发展的阶段性是以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依托的，这样的研究思路在有些朝代或许并不适用，但对唐诗宋词的研究却是合适的，如唐诗流变的阶段性大体是与唐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起落沉浮合拍的，所以，研究中思考的基本脉络是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政治、经济的起落沉浮为线索，去考察这些因素对诗人群体文化性格所形成的阶段性影响，以及一个阶段的文化语境如何通过诗人的思维模式、人格模式的中介作用对诗歌发生作用，从而使诗歌的发展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色彩。其实，从唐诗到宋词的文体转换也是以历史的发展作为最根本的驱动力而实现的，本书第六章就体现了这样的思路。

在这个原则中，最核心的是“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的研究毕竟都是文学的外围研究，最终必然要回到“文学本位”原则上，关注文学之为文学的主要品格：审美功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语言风格、文体功能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在每一个单元论述中，采取的路径往往是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语境还原开始进行思考，而后立足于诗词的审美风格及其感发魅力的研究。

2000年至2001年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袁行霈先生研习李商隐诗歌，先生为学严谨，为人谦和，他要求我们细读文本，写出读书报告在课堂上进行交流讨论，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先生自己做精彩的阐释，展现出他特有的学术智慧和大家风范。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先生在百忙之中认真批阅我的读书报告及相关的研究论文，并对我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具体细致的要求，这一切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学术思考和研究。回到学校后还经常得到先生的鞭策与激励，这本书的出版，我不能说是对先生的鞭策与激励的回报，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离先生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愿意心向往之，勉力为之，以有涯之生去做无涯的追寻。

2006年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唐诗宋词综论	(1)
一、唐诗：众声喧哗中开放的奇葩 ——唐诗的融通之美	(1)
二、唐诗“惊人”的诗美理想与“求奇”的时代 性情	(19)
三、宋词创作的文化心理矛盾与词文学美学体征的 变化	(32)
四、宋代文体互动与词体的发展	(48)
第二章 初兴帝国的诗歌美学期待	(66)
一、贞观君臣的文学观念及诗歌创作对唐诗发展的 影响	(66)
二、凌云健笔意纵横 ——初唐四杰儒侠互补的人格精神与唐诗刚健 风格的形成	(78)
三、从陈子昂到王维 ——生命主题在初盛唐诗歌中的回潮与消歇	(89)

第三章 盛世的激情与怨怼	(102)
一、李白、杜甫诗歌的盛世悲音	(102)
二、盛唐送别诗的主体特征及其文化成因	(116)
三、儒家化的隐逸与任侠：盛唐山水田园诗与 边塞诗的文化精神	(130)
四、盛唐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审美形态比较	(144)
第四章 乱后的拯救与沉寂	(150)
一、赎罪、拯救与逍遥	
——白居易讽喻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150)
二、情激调变，怪怪奇奇	
——韩愈诗歌审美风格流变原论	(160)
三、李贺诗歌的死亡意识	(172)
第五章 秋色的萧瑟与明艳	(185)
一、李商隐诗歌的悲剧意识	(185)
二、李商隐诗中女性形象两极化倾向及其对诗风 的影响	(196)
三、李商隐的悼亡诗	(209)
四、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李商隐爱情诗的“间阻之慨”	(221)
第六章 “诗余”的奇韵与别情	(242)
一、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	(242)

二、“百家锦衲”与“七宝楼台”：长吉歌诗与梦窗词比较	(256)
三、唐诗宋词中城市功能的演变与文体的转换	(271)
 第七章 宋词的文化个性及其独特品位	(287)
一、欧阳修词的悲剧意识及其对词境的拓展	(287)
二、浪子人格与柳永词的创作	(295)
三、词中花木兰——李清照的性别出位与回归	(310)
四、辛弃疾词的英雄意识	(327)
 后 记	(343)

第一章 唐诗宋词综论

一、唐诗：众声喧哗中开放的奇葩

——唐诗的融通之美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所以鲁迅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①，闻一多先生则说明清两代的诗歌运动都是无味的挣扎^②。为什么在唐代会出现这样一个光华灿烂的诗歌时代，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等原因合力而成就的，但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唐诗是大一统、大融合形势下的产物，从上层官方文化到民俗、民族、地域等各个层面都处在相互的渗透融通之中，从而使社会生活呈现出众声喧哗、多姿多彩的状态，这种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时代特点，一方面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影响着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及人格风范，并由此形成唐诗的融通之美，使得唐诗像变幻无尽的魔方，让不同时代的读者在其中回味无穷。

① 鲁迅著：《致杨霁云》（1934年12月20日），《鲁迅全集》（12）第6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参见《闻一多全集·甲集》，第203页，开明书店，1948年版。

(一) 众声喧哗的文化氛围与唐诗内容的融通之美

在唐代近三百年间，从上层典雅精致的官方文化到民间的民俗文化都处于一种众声喧哗、多元融通的格局中。从上层官方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三教融合的广阔空间：开元十年（722），唐玄宗向天下颁布了他的《孝经注》，开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732—734），又颁布了他所作的《道德经御注》，开元二十二年（734）又完成了他注释的《金刚经》，唐玄宗对儒道释三家的经典著作的注释，预示着三教的融合，所以，“在八世纪上半叶，过去作为边缘的佛教、道教，却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的、最富于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①，不仅如此，“西亚之火祆教、景教、摩尼教，亦于唐代先后盛于长安”^②，这些宗教信仰在唐代这样一个百川汇聚、有容乃大的时代都找到了自己立足发展的空间。“在政权运作方面，在人才选拔与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士人人仕，致君尧舜，建功立业，持儒家入世的进取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方面，则就时时杂入释、道”^③。在个体文人身上，往往是出入三教，采取儒道互补，旁采释家的通融之法，如白居易宣称“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又说“外服儒风，内宗梵行”，（《和梦游春序》）取舍极为融通自由。其他如王维早年尊儒尚侠，中、晚年礼佛；李白出入儒、仙、侠、纵横之间；李商隐学道玉阳而又心怀天下……这对唐人的精神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深远

①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册 85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② 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 41 页，三联书店，1987 年版。

③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 206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的，佛教之于王维诗歌，道家之于李白、李商隐的诗歌，儒家思想之于杜甫、白居易诗歌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影响了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而且影响了他们对题材内容的选择，如王维早年以儒家精神行世，在题材选择上偏向政治讽刺诗与游侠边塞诗，后期受释家浸润后，题材自然偏向山水田园诗；白居易选择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创作与其儒家诗学思想有密切关系，而后期选择闲适诗的创作也与释道思想有关。在唐诗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各种思潮会有主次消长的流变，如韩愈尊儒反佛、武宗灭佛等，但综观唐代，多种思潮始终并存兼容，只是随其起伏流变对诗歌的影响程度不同罢了，而诗歌题材在变化更替中也显现出并存兼容的态势。

唐代特别是唐初统治者对外来民族和文化都能够采取兼容的政策，这与李氏家族的出身有关。李氏皇族本为鲜卑化的汉人，这个家族不仅有着鲜卑血统，而且长期生活在胡汉杂居之地，受到外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一视华夷，并影响了朝廷的对外政策，唐太宗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所以大唐帝国的朝堂之上才会出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万方来朝盛大场面。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与西域、印度、日本等东亚、南亚国家的交流规模和频繁程度都是其他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难以比拟的，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前，大唐统治者出于对自身统治和对中华礼教能够化成天下的强烈自信心，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外来的风俗文化，而“安史之乱”后，国势衰落，对社会风俗胡化的忧虑也随之产生，这是士大夫在唐王朝衰落过程中对自身力量缺乏信心

的表现^①。从这一点也更能看出，唐人恢弘的胸怀气度和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是以强盛的国势、辽阔的帝国版图为基础的。

从民间的民俗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外族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传入，使现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炫人眼目，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胡汉融通的民俗空间。由于民族交流的加强，胡化倾向是唐代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过去并不占主流的异族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也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新鲜、最风行的时尚”^②，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甚至婚俗都受到了异族的影响^③。“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旧唐书·舆服志》）在乐舞方面很明显的是唐代宫廷十部乐中后七部都不是中原音乐而大都来自西域，“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伎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是中唐诗人元稹在《法曲》一诗中对西域乐舞及文化盛行长安的描述与总结。所以，唐代的社会生活与传统农耕文明以及儒家文化所规范的生活范式有所不同，生活情调更为热烈奔放，绚烂多姿。这种胡汉融通的民俗空间使得唐诗的创作主体以一种好奇热烈的目光去关注和表现带有异域特色的景物风习与人物，使得唐诗具有了奇异而丰富的异域风情。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的确，岑参两次出塞写下的边塞诗奇丽壮美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其着意于边地奇异自然风物与异域民情风俗展现的诗中，潜流着的是诗人那浪

① 参见葛晓音著：《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3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1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③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册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漫好奇的性情。其实，唐代诗人中“好奇”的何止岑参，中晚唐“好奇”诗人已不是个体，而是群体，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自然的景色风物已不能满足他们好奇尚险的心理，所以要“笔补造化”，与岑参诗笔延伸到异域风物人情不同，他们把虚荒诞幻的超现实境界带入了唐诗。

在唐诗中，我们能够看到劝酒的胡姬、波斯的商品、天竺的高僧：“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之二》）“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笛”，（李贺《龙夜吟》）而在岑参的诗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异域风情的琵琶羌笛，欣赏到旋转如风的胡旋舞；在自然风光方面，因为南北统一，也因为对异域风光的好奇，唐诗也呈现出广阔的地域风貌，有北地边塞“胡天八月即飞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丽壮美，同时也有“千里江南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南国旖旎柔媚，总之，唐诗从人物风情到地域风光都显现出多元并存的融通之美。

（二）诗人人格的融通之美

在以上的论述中，侧重于唐代多元化文化格局对诗歌题材内容丰富性的影响，其实这种文化氛围更为深刻地影响了诗人的精神人格，使唐代诗人的人格显现出融通之美。

在多元的文化格局和眩人眼目的感性生活中，唐人思想在整体构成上是极为丰富的，这就使得他们在观念与态度上不盲从一端，取舍自由通脱，并形成了潇洒行世的人格风范，过去困扰士人的出处、仕隐、进退的矛盾在唐人这里应对得极为融通潇洒，李白以隐求仕，王维亦官亦隐，白居易的中隐观等都未截然划分仕隐的界限。另外，唐代开阔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唐代诗人绝大部分是理想主义者，这种浪漫精神体现在对政治、人格、情感的追求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

十二韵》)是政治理想主义,“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是人格追求的理想主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是爱情追求的理想主义,都极为高远执著。他们的理想并非求一官职以养终身或沉溺享乐其间,更多的是要求体合个性、建立功勋,所以出处自然,进退裕如,一旦感觉局促难展,便拂衣而去。李白在朝廷自请放还、高适辞封丘尉、杜甫辞华州司功参军无不如此。唐诗中充满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极度张扬和对平凡生活的诗意超越,与他们高远的理想、潇洒行世的人格风范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唐代诗人潇洒行世的人格风范是以儒家济世精神作为底蕴的。一方面,他们大都出身庶族,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家教礼法,不拘儒学正宗,思想上狂傲豁达,行为上也放任不拘,往往借助任侠形式,“好语王霸大略”,去“游说万乘”、“喜仗义疏财”,李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醉酒求仙,傲视权贵,平交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一醉累月轻王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这是历代知识分子向往而又不敢实践的境界,一直到晚唐,杜牧还有“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的狂傲之气。但是,另一方面,唐代诗人这种狂放行为与魏晋名士出于避祸全生的颓废放纵不同,更具有一种任情率性的自然,正如裴斐先生在评价李白时所说的那样:“魏晋名士、晚明作家,其中有的人在思想上更急进,行为上更放肆,但是,李白同他的先行者和后继者相

比，显得更高大、或者说更健康。”^① 这是因为唐代诗人大都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从王勃“不甘憔悴于圣明之代”到李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再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至晚唐李商隐的“欲回天地入扁舟”，处境虽有不同，而心志不异，无不跃动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所以李白的浪漫精神本身就是大唐融通之世的产物，所以在他的人格精神中“除了超脱还有执著，除了傲世独立还有热情、天真和恳挚，即不满现实而又热爱人生”^②，也就是说，唐代诗人在兼容诸家之时，大都能以儒家济世精神作为底蕴。

潇洒行世的人格风范反映在诗人的创作状态上就是放情为文，较少文品与人品的割裂。梁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存在这种人心与文心分裂的情况，而在唐代，时代的感召，诗人对自身才华的高度自信，飞扬的人生意气，都有助于形成放情为文的创作状态，对此，唐人有着非常自豪的表白：“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李白《长歌行》）“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刘叉《自问》）李贺认为人生在世，虽然“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他在《赠郑夫子鲂》中写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任情率性，无所拘束，是唐人潇洒行世的人格风范在诗歌创作上的写照。

① 裴斐著：《李白个性论》，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第3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裴斐著：《李白个性论》，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第3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